

文革博物馆专集（十一）

在整个文革期间，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场，唯独上海工总司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分析这个文革的宠儿，就可解构中国工人造反派从兴起到悄然退出政治舞台的历史。

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次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领导下，自上而下，层层发动，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群众运动的主体是党组织。而文化大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则是抛开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由毛泽东直接发出号召，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冲击原有的领导体制。群众运动的主体是自发性的群众组织。

◇ 工人造反派结束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是第一个登上文化大革命舞台的群众组织。它表现出年轻人疯狂的热情和理想的追求，体现了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理想。工人造反派却把人们从理想的梦境拉回现实的泥潭，使大革命很快便失去了浪漫色彩，显露出血与火的本质。

红卫兵运动的黄金时代只有几个月，这段乌托邦理想的蜜月随即变成痛苦的回忆。到一九六七年初的权力再分配中，工人造反派已独占鳌头，红卫兵则成了可怜的点缀。一年以后，随着“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红卫兵运动便成强弩之末。有意思的是，工人造反派是在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产生的，最后却由工人造反派来结束红卫兵运动。

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

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十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上海工总司的兴亡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缩影，上海工人造反派有一些重要特征是其其他造反组织没有的或者说不可能有的。

◇ 全国性动乱的发端

全国群众造反组织中没有一个是象上海工总司这样完整地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工总司初期作为自发的非官方的群众组织崛起，两年以后当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或者归口合并，或者被人砸掉，或者自行解散时，它却在合法的外衣下将原有的组织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从一个特殊时期的造反组织演变为长期合法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机构。用王洪文的话说：“工代会即工总司，工总司即工代会。”直到策划武装叛乱失败，工总司才走完它全部历史的最后一步。也可以说它是全国最后一个被迫退出文化大革命舞台的角色。

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相比，不仅存在时间短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和破坏也相对表层化，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没有真正触动社会的结构和基础。但工人造反派一旦行动起来，就会牵动全局，影响整个社会。工总司在它成立的第二天就卧铁轨拦火车，造成半个中国铁路运输瘫痪，这是全国性动乱的真正开端。

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跃的力量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没有主动参与过运动。文化大革命对农民几乎没有触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在骚动了一阵之后即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被赶下舞台，只剩下工人造反派唱独角戏，他们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义进驻上层建筑，控制了全部权力。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

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

◇ 上海工总司独占鳌头

并不是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有这种幸运，上海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的宠儿。工总司的特殊地位凭借了它与中央文革的特殊关系，在中央决策层活动的几个极左派与成为他们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直接勾结起来。这种情况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的。他们的勾结不是一般意义上领导和群众的互相结合，而是结成一个政治帮派。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准备时期已经勾结起来了，但只有在王洪文加入之后，这个帮派才真正形成。

王洪文的加入不只是增添一个帮派同伙，而是使这个帮派从党内小集团变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王洪文这个角色是不可轻视的，也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这个帮派的形成使工总司不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使工总司的政治能量为其他群众组织所无法比拟。所以，全国造反派唯上海工总司马首是瞻就毫不奇怪了。

◇ 四人帮缺王洪文不成

在王洪文加入“四人帮”之前，工总司已经形成以王洪文为头头的帮派体系。工人造反派中的帮派意识与这支队伍的政治文化结构有关系，也与传统的民间造反模式有关系。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状态，使得原来只能在地下隐蔽的帮派活动变成公开的旗帜，帮派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

文化大革命前期主要表现为群众中的派别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则主要表现为上层的权力斗争，在造反派中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帮派体系并且保存十年之久，全国唯有上海工总司。而工总司能够在十年中聚而不散，帮派性是它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如果说要象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制作标本的话，上海工人造反派无疑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标本，它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典型性和重要性是独一无二的。

工人造反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代表并非偶然，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

和中国任何一次社会大变动一样，知识分子总是敏感的先知先觉者，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主角是极左派知识分子和以红卫兵面目出现的小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构成一场运动的主体。当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车站事件（明报月刊编按：指一九六六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赴京上诉被阻于上海市郊安亭火车站）崭露头角之后，立即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因为它符合毛泽东头脑中的构思。

◇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

毛泽东从韶山冲走出来，与中国农民血肉相连，他打天下率领的也是一支农民队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且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寄予极大的期望。因此，当他发现上海工人中有那么一些他所期望的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时，他在感情上和理智上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他与王洪文的私下谈话中几乎肯定了工总司造反初期的一切越轨行为。他公开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贺电支持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例外，他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更给工人造反派“领导一切”的权力。他希

望工人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使文化大革命真正赋有无产阶级的性质。

任何真正意义的社会变革必然有一个作为推动者的社会中坚力量。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把这个重任寄托于工人阶级。但是毛泽东显然不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和受压制者成为毛泽东赞赏的造反派，这些工人造反派并不具备现代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素质，许多人沾染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他们只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当要冲破旧体制的罗网时，这股力量的破坏性是可以利用的。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应当及时地淘汰他们，而毛泽东则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代表。显而易见他们是无法承担毛泽东赋予的历史任务的。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战略上的失误。

◇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泽东这个政治上的失误与他理论上的失误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所理想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阶级只是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而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不属于先进阶级。从这个理论失误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应当由工人阶级来占领上层建筑，改造知识分子，即由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由没有文化的人去领导有文化的人，文化落后的人去改造文化先进的人。当世界已经进入科学技术成为最伟大的生产力的时代，这样的占领不能不是一种破坏和倒退。

毛泽东的理论失误给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

上海工人造反派崛起时只有几千人，在工厂里是绝对少数派，但他们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在当时颇有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气势。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们迅速发展成为多数派。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不是夺权，而是它赢得了群众的大多数，这使它成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有些研究者无视或者否认多数这种痛苦的事实，但历史事实不是任人涂抹的。

◇ 从多数到少数

自然，形成这个多数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正是这个多数无情地揭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作为胜利者，工人造反派没有能够保持这个多数。他们被自己夺到的权力所腐蚀，迅速暴露出他们本来掩盖着的种种致命的弱点和不可克服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亿人参与的群众运动逐渐蜕变为少数人的权力斗争，暴露了它的本质还是少数人的政治。

因此，那些曾经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斗争逐渐使人们淡漠疏远，那些越来越频繁的斗争甚至脱离了他们最基本的造反派群众，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只是少数造反派头头。

这个蜕变过程决定了工人造反派必然失败的命运。

工人造反派的必然失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工人造反派刚从安亭崛起时，大多数人对他们抱有成见，还难以预料他们会干出什么事业来。当他们横冲直撞、大刀阔斧地突破现行的政治规范、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时，人们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了。

大多数人曾经虔诚地相信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们以为将要看到一个崭新的体制、崭新的秩序和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即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宣称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人们耐心地等待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只存在于宗教式的梦幻之中。

◇ 平均主义要求与封闭意识

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了，新的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毛泽东声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破与立是两个过程。当这两个过程完全脱节时社会必定陷入大混乱。

工人造反派是具有破坏力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冲破罗网时可以叱咤风云，但他们却没有创造和建设的能力，即使在他们能够有所建树的经济领域里也无所作为，他们只是重复一些现成的流行的口号，他们批判“管卡压”，反对大工业的科学管理；批判“利润挂帅”，反对基本的经济规律；批判“物质刺激”，反对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批判“洋奴哲学”，反对开放国门。这些口号实际上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要求和反现代化的封闭意识，这是工人造反派最本质的思想特征。

工人造反派这种反现代化的思想特征是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勾勒的那种自给自足、平均主义、小而全、封闭式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中孵化出来的。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当时却有极大的迷惑性。

但是，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不可遏制的历史要求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任何反现代化的努力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归根到底要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也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中国经济在一九七六年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偶然的，这是工人造反派最终垮台的最深刻的原因。

萧关鸿——上海作家，李逊——中国大陆留美学者

□ 原载《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 输入：叶森树

∞ ∞ ∞ ∞ ∞ ∞ ∞ ∞ ∞ ∞

文革大事记

◇一九六五年

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名批判该剧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其后发展为全国性的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运动。

◇一九六六年

二月七日，以北京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五月十六日通过《中共中央通知》，为文革确定了理论、路线和方针，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主要对象。会后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陆平等，受到毛泽东支持，由《人民日报》在六月一日全文发表。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针对刘少奇。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七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红卫兵展开“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活动。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由《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

一月三日，上海“造反派”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到翌年九月，大陆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由军队干部、地方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接管权力。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

二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被称为“二月逆流”。

七月十八日，江青等组织“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进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七月二十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扣留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高潮。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在河南号召“文攻武卫”，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建军节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后被毛泽东追究，导致王力和关锋下台。

◇一九六八年

八月二十五日，为了制止学校武斗，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先后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九六九年

三月，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新的党章正式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九七零年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展开激烈斗争，陈伯达下台。

◇一九七一年

九月十三日，林彪携妻、子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一九七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北京，与周恩来签订《上海公报》。

◇一九七三年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洪文升为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四年

一月，开展“批林（彪）批孔（子）”运动，江青等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复出。在十三日至十七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十一月毛泽东发起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

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四月五日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遭到镇压。四月七日，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再次下台。

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

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等策划逮捕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华出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

□ 根据《亚洲周刊》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输入：周其弘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三十年后思考文化革命的几个问题

• 朱嘉明 •

如果说，中国的文化革命是以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为起点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整整过了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今天，将思考文化革命的几个问题写下来，与对文化革命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

## (一) 文化革命是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开始，并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结束。

在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季，林彪曾经有一篇讲中国历史宫廷政变的讲话。林彪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在这篇讲话中却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历朝历代的政变加以分析。据有关文献，毛泽东本人对林氏的这篇讲话的反应是很负面的，至少不以为然。问题在于，为什么林彪在那时要研究中国政变史，究竟是让毛警惕政变呢，还是启发毛运用政变的手法去击败政治对手。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其实并不需要别人提醒他如何防止政变，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更不愿意自己的政治对手警觉到这个敏感的历史课题，以及去联想现实政治。因为，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把群众运动与宫廷政治结合在一起，并把成功的宫廷政变作为文化革命的端点。人们都应该记得，文化革命的全面展开，是以所谓的“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为指导思想的，而“十六条”的通过，则是依靠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氏成功地进行了宫廷政变，让刘少奇及其支持者丧失了决策核心中的资格。并且通过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而公布于世。至于文化革命，在毛泽东去世不久，以所谓“四人帮”被捉而告结束，宫廷政变则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古今中外，只要政治制度是封闭的，不透明的，非民主化的，势必就有宫廷政治，而宫廷政变就是宫廷政治的一种重要的运作方式。从前苏联的历史，以及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中，不难发现，“宫廷政变”存在的基础之一是极权政治体系！其权力的移交并不是依靠共产党党章，或者宪法的规定进行。而是在统治核心集团中，一部分人用非常的方式和手段将另一部分人击败，之后再求得合法的认可。文化革命中期，林彪曾经企图发动一次“宫廷政变”，但是，失败了。所以，文化革命中的“宫廷”的结构、特征、组织、变迁，无疑是值得后人研究的。本文这里说的是：宫廷政治是文化革命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侧面。

## (二) 文化革命中“失控”与“反失控”的冲突。

目前所能得到的有关文化革命的文献证明毛泽东并没有预见到文化革命要持续十年之久，他关于文化革命的设想与文化革命的实际差别极大。毛本人从文化革命初期就意识到文化革命局部、甚至全局“失控”的可能性。这种“失控”究竟指什么？很清楚，“失控”是指他们依赖的群众运动的失控，具体地说，是各类群众性组织的失控。在文化革命中，各类群众组织，不论是保守派的，还是造反派的，数不胜数。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彼此消耗，是有利于维系毛泽东，以及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权威的。但是，自文化革命初期开始，群众组织的“发育”就含有令毛泽东不安的“失控”基因。这种基因包括：纲领化，并将纲领与理论相结合，向毛本人的思想体系挑战；跨省化，即一些组织寻求省际之间的组合。甚至力求形成全国性的组织；产业化，即一些组织寻求实现全国同产业的大组合；资源稳定化，即群众组织追求形成稳定的财政来源，以维系长远的政治目标。所有这些“基因”表明，所谓文化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具备自身发育、成长的可能性。这种发育超过一个“界限”，就会尾大不掉，构成对毛时代政权的威胁。因此，从文化革命的初期开始，毛泽东非常警觉打击任何群众组织全国化的可能性和趋势。与此同时，对凡涉及到国家政治理论基础的思潮，也从来没有放松过“清洗”与“镇压”。所以，这种“失控”与“反失控”，是文化革命中一个相对不引人注意，然而却相当重要的方面。最终，毛泽东寻求出了一个“反失控”的结构：

◇用群众组织制衡他要改变的原有的党的系统，用当时的话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



◇用军队，依靠“三支两军”的方式控制住群众组织；

◇用文革中的新文官，诸如张春桥、王洪文等入主军队，制衡原本存在有“山头”与“派别”的军队。

这是一个“反失控”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至毛泽东本人过世之时，依然存在。在此期间，政府的日常运作，则是笼罩在上述的“大三角”关系之下的。

### (三) “血统论”在文化革命中的地位。

所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都会记得：在文化革命初期，有过遍及全国的“血统论”辩论。这场辩论起因于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与此同时，文化革命中，人民被划分为“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贫农、下中农、工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当然，还有一部分民众既不属于“红五类”，也不属于“黑五类”。“血统论”的辩论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时中央文革的成员陈伯达专门讲了话，批评了上述的对联。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引用了一篇题为《触（上龙下言）说赵太后》的古文，表明对“血统论”的忧虑。但是，真正造成支持“对联”势力削弱、瓦解的原因则是：其一，很多干部子弟由“红五类”顷刻成为了“黑五类”；其二，对联代表了一种新权贵、新贵族意识，以至很多可以属于“红五类”的人，也不支持“对联”。但是，“血统论”事实上，则是文化革命最重要的理论基石。道理十分简单，文化革命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观念的具体化，则要讲到家庭出身，讲到本人阶级成分，所以，“血统论”与阶级理论成为不可分割的。文化革命中，有一个阶段实行“清理阶级队伍”，则是对“血统论”的实践。由于“血统论”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对“血统论”的批判，必须冒极大的政治风险。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正是因为踏入了这个“禁区”，触及到了要害，才遭到杀头之罪。而支持遇罗克的《中学文革报》也顷刻瓦解。

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北京文化革命期间的中学两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其分歧，表面上是对于解放军军训立场的不同，但究其根源，则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锺奇发表了赞同“血统论”（或者“对联”观点）的讲话，引起中学生的哗然与反对。在当时的复杂政治背景下，形成了“四三”派，又形成了对立“四三”派的“四四”派。顺便提及的是，“血统论”并没有完全因为文化革命结束而消失。当今中国的“精英治国论”包含着“血统论”的成份，因为在某些人的定义中，精英包括着血统的条件。至于毛泽东本人有没有血统论的意识，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共产党，以及相当多的欧洲共产党是很为不同的。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农民的比例太大了。不过，说到这里，也掉入了“阶级分析”的“陷阱”。

### (四) 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中的“分裂”。

整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沦落为改造对象。但是，在文化革命中，并不存在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在文化革命发生中，中国从一九四九年以前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来得及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中间的相当一批优秀分子，还戴着“右”派的帽子，丧失了参与文化革命的资格。因此，文化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分子，主要是幸免于反右斗争打击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为当时的“左派”，以及广大的青年学生。如历史所表明的，这支知识分子队伍在文化革命中，不仅分化在各种群众组织的派系中，而且分裂在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中。至少包括以下几种思想体系：

◇正宗，或马克思主义教义体系。这批知识分子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革命，是以正统的，或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的。其中一部分人在后来演化成改革时期的新“左”派，另一部分人则进步到民主派。

◇西方人文主义体系。这些知识分子受到法国启蒙学派之影响、接受文艺复兴的启发，倾向于人道主义，探索人性，靠近西方政治理论，向往民主政治。

◇经济至上体系。这些知识分子崇尚经济救国、科技救国，主张发展国民经济优先。这批知识分子注重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演变。不论对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式的经济改革，或者对西方市场经济都持以积极态度。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溶入了一九八〇年代的经济改革。

仅仅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革命最终的反思与批判是不够的。特别要注意到在文化革命的大环境之下，他们是如何分化的，而这种分化对文化革命以后的历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文化革命中有三名知识分子遭到政府的处决，一名是辽宁的张志新，一名是北京的遇罗克，一名是上海的王申酉，如果对他们三人的思想体系，略加分析，不难看出其差别所在。

(五) 文化革命中的外交政策，或外交战略的对内影响。

文化革命的先声是“反修、防修”，即反对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到了文化革命之中，反对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已经演化为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与前苏联在东北与西北边境的武装冲突，使两国关系一度达到战争的边缘。可以这样说，在文化革命期间，对抗苏联，把苏联作为第一号敌人，成为中国外交政策，或者国际战略的主要支点。三十年后，就象对东西方对抗的“冷战”作反省一样，寻求“冷战”的真实动机，也应该寻求当时苏联威胁的足够事实。到底前苏联是否准备了一场与中国的战争？原苏联是否可以在东西两面都处于军事对抗状态？这方面，应有人专门研究。本文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文化革命中的反苏战略，对于清算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敌，是极其相关的。一九五九年彭德怀的垮台，一九六六年刘少奇的垮台，都是以苏联为政治背景的。彭德怀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的朱可夫，刘少奇则成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实毛泽东与苏共的对抗由来已久，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几乎都是亲苏派，或与苏联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例如，林彪走头无路，也要投靠苏联。这样，只有在国策上对抗俄国人，才可以有效地避免党内亲苏势力的形成，最终丧失权力。所以，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是有逻辑联系的。邓小平虽一度被称之为“第二号走资派”，但是，没有落到刘少奇的下场，那是与邓小平与苏联没有太多历史渊源，而且参与领导反对苏修的辩论的历史有关的。如果以上的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毛泽东寻求与美国关系的突破与正常化则是十分迫切的政治需要。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可以完全合作的。请人们注意，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垮台，仅仅半年不到时间，一九七二年初，尼克松访问中国。可见，林彪的垮台，最终使当时党内可以统一到寻求与美国和解的立场上。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波士顿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2007期

∞ ∞ ∞ ∞ ∞ ∞ ∞ ∞ ∞ ∞

超脱集体健忘

• 杜维明 •

一九八九年秋季，北美的三个东亚研究中心——伯克莱、密西根和哈佛，曾经在马里兰的安堡纳斯举行过一次以四个重要事件为主题的中国问题研讨会：法国大

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我曾怀疑过：为什么这样几个不同的日子，可以这样串起来作为一个会议的主题呢？特别法国大革命与鸦片战争，本来是距离很远的事情。现在回想，主要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思想界受法国启蒙心态的影响极为深刻，当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咸认，只有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才能拯救中国。这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撞击的经验有关。四九以前，中国发生过的许多浩劫——如同犹太人的H o l o c a u s t，都和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四九以后的浩劫，虽然与帝国主义仍有关系，但更多的却是内部原因，即所谓“自作孽”。因为意识形态的强化、内部的权力斗争、个人的权力欲，还有很多其它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配合外面的压力所造成的浩劫，给民族带来很大的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浩劫——或者说是各次浩劫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三十年前中国发生的文革。

文革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中间波及的层次、侧面太多，特别是知识界，受到残害的人数相当惊人。但是对文革的反思工作，却一直碰到许多困难。最具体的、也是最让人惊讶的方面是：历史上各种浩劫，包括犹太人的H o l o c a u s t，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的界线非常清楚，哪些是迫害人的凶手，哪些是被迫害的牺牲者，判然分明；迫害者会受到很大的谴责，被迫害的对受害的原因有一定的理解，也必然会获得应有的同情，这一切虽然不是一目了然，但界域分明。但文革的浩劫，也包括四九年后中国发生的许多浩劫，情况却大不一样。常常是，被迫害者的内疚不安往往超出了迫害者，而迫害者，却常常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迫害者，而且以为理所当然，不仅没有内疚，甚至气焰还挺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当然与四九年后社会复杂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有关，也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遇到各种不同的灾难，政治体制要想图存、自强等等复杂的原因相关。对这一切应该如何进行理解、反思、讨论？到目前为止，不仅思想上没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方式予以支持，甚至连大家能够取得共识的语言、话语还没出现。这等于说，被迫害者还没有寻求到一个能够表述浩劫经验的最基本的行动文法和象征符号。这就是为什么，近十多年来，我们开始要讨论“毛文体”、“党文化”的问题，力图从更深刻的符号学、文化学等等方面，寻找到思考的出路。这些思考，目前虽然还是处在非常初级的层次，但逐渐深化不仅可能，而且大有必要。

我们身在海外关切中华大地的读书人，文革的资料来源本来就很片面，又因为隔了很多层，要获得深刻的认识，难度很大。但是，也可以把文革的问题，放到海外中华——或者说大中华圈、文化中国的范围来看。印尼在七十年代初，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排华事件，七十万被残杀的人中间，有很大的比例是华裔。当时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卷入文革，台湾因为一直觉得苏哈托打倒苏加诺是反共胜利，对此都没有反应。至于新加坡还在草创建国的危机时代，马来西亚的华人则处在人人自危的状态，这个事件的出现，本来也是海外华人社会一场值得正视的浩劫，但是华人社会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和共鸣，这等于说，好，就让它这样淡忘了事，本来也并无切肤之痛。反而是西方的媒体，当时给予了很多的报道。到现在为止，印尼华人社会发生的这一场浩劫，从来没有人做过深刻的研究，相应的社会后果当然更无从谈起。马来西亚后来也发生过许多次的排华事件，在海外华人社会也没有得到什么关注和反应。可以说，所谓“海外中华”，即使作为“想象的社群”，也没有什么整合的意义；只是很多散离的华人社会，为了自保，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血肉或感情的联系。可以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以前，贯穿世界各地的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并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在最近的二十年里有了改变的契机。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前，在中华大地所发生的浩劫，都是中国人自己承受，周近邻邦只能旁观，感受不到它的震荡，只知道里面也许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最费解的是，文革前由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所饿死的人数，确切的很难说，大概在三千万

以上，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据我所知，当时不必说，迄今为止，在国内了解到发生过这么大的灾难的人，比例并不很高。在海外，当时甚至有这样的传说，周恩来曾向一些专家请教怎样存粮食的问题，因为数字膨胀，中央还为粮食太多而发愁。根本不知道发生饿死人的问题。很多地方饿死人，别说海外，就是邻居也无法相助。正象一些研究者指出的，这一场大饥荒，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互助机制都被破坏掉了才会发生的浩劫。以前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各地粮食的调配总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至少情况不至于发展到这么严重，现在都不行了。这显示出一个现象：当时中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多的浩劫，外面竟懵然无知。欧美就更不用说了。文革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实际上是最好的，单单是这一点，就充满讽刺的涵义。这种情形在七九年以后，彻底改变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已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和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六四”事件在海外引起的震撼，就和文革时期大不一样。往前看，将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不管任何重大事件，一定要波及四邻，一定要影响到亚太、影响世界，是好是坏，都必然如此。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最近中美关系一直在恶化，但也不是没有变化的契机，比如双方都同意一起来讨论环保的问题。最近在艾思本人文中心有一个相关问题的讨论会，美国副总统及国务院都有代表参与其事，希望围绕中国的环保、人口与农业、都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和粮食问题，和中国专家一起讨论。很多专家认为，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在十一、二年以内，中国粮食的基本供应即会发生问题。由谁来为中国提供缺粮的部分？中国的粮食、人口、环境污染的问题，也是人类的问题。这不象从前，不是关起门来就可以自己解决的。

我对文革这方面的课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假如对自己文化社会的阴暗面不敢去面对，忘记历史，那错误一定会重复。没有勇气面对黑暗，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体健忘症盛行，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患上的朝野锢疾。当年邓拓指出过这一点，却惨死于文革中的批斗。今天大陆官方不接受巴金等知识分子的建议，尽量避免触及文革，仍然是想淡化乃至忘却这些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与二战以后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对法西斯纳粹主义的正面揭露、长期反省，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可以这么说，要想对文革进行深层的反思，首先要超脱集体健忘。没有对文革真正深刻、全面的反思，文革作为一场民族浩劫的恶梦，就不可能消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海外知识分子，今天要在这里——远离北京和大陆的地方，聚集起来讨论和纪念文革的原因。最后，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相当薄弱，而且“内耗”层出不穷。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常深陷浪费精力的争斗而执迷不悟。在攻击对方观点时充分暴露出狠打落水狗的威风，但在剖析自家论据缺失方面则柔软无力，这正是不敢、不肯、不能面对心灵积习中的阴暗面和丑恶实质的衰象。一个民族在身心精神各层次的创伤，不能靠“过去不堪回首而前景一片大好”的幼稚乐观来调护医治。王阳明所谓“拔本塞源”正是要我们从根处反思。但是，肤浅地诅咒中国民族劣根性而加以全盘否定，又恰恰是不负责任的自我开脱。文革的阴魂不散，中华民族的心灵便无法拨云雾而见青天。反思文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承担的自淑之途。

（据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文化中国：文革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整理人：苏炜，全文经作者校定。）

□ 原载《民主中国》 总34期

~~~~~

【往事如烟】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革记愧

——渴望活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

• 史铁生 •

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钱先生却还没完，接着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这样，也恰好有了篇名。

◇ 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

七四年夏天，双腿瘫痪已两年，我闲在家里没事做，老朋友们怕我寂寞常来看我，带书来，带新闻来，带新的朋友来。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谈，尽管对时势的判断不全相同，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想法也不再能彻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岁，单单活明白了一点：对任何错误乃至反动的东西，先要敢于正视，回避它掩盖它则是无能和理亏的表现，除此一点之外，如今想来是都可以作为愧而记录的。

先是朋友A带来了朋友B。不久，B带来三篇手抄本小说给我看。现在记得住标题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标准归类，它应该属于“伤痕文学”；应该说那是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我看了很受震动，许久无言，然后真心相信它的艺术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动。这样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方法，那时很流行，现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论根据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现成而且更有威力。“中间人物论”呀，“写阴暗面”呀，“鼻涕和大粪什么时候都有”呀，“阶级立场”和“时代潮流”呀，等等，足令B无言以对或有话也不再说了。我自视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马列的书读的本来不算少，辩论起来我又天生有几分机智，能为那些干瘪的概念找出更为通顺的理由，时而也让B陷入冥思。现在我知道，为一个给定的结论找理由是一件无论如何可以办到的事。B为人极宽厚，说到最后他光是笑了，然后问我能否把这些小说给他复写几份。我也显出豁达，平息了额与颈上暴涨的血管，说这有什么不行？一来我反正闲得很，二来我相信真理总是真理，不会因为这样的小说的存在而不是真理，存在的东西不让大家看到才是软弱或者理屈。我们一时都没想起世上还有公安局。

我使用了几个上午帮他抄那些小说。抄了一篇或者两篇的时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笔下流出的字行与我的观念过于相悖，越抄心思越别扭起来，竟觉得象是自己在作那小说，心一惊，停一会，提醒自己：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抄，况且我答应了朋友怎么能不抄完呢？于是又抄，于是又别扭又心惊，于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于是……终于没有抄完。我给B写信去，如实说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来了，一进门就笑，依然笑得很宽厚，说那就算了吧，余下的他另想办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没抄的都给他拿去。

◇ 编谎话来保护自己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处，朋友C从A处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学校里去看，被她的一个同学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C立刻就被隔离审问，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员手里。我们听说了，先还只是为C着急，几个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想来想去，不仅想不出怎么救C，却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笔迹。这时我还未及感到后果的严重，便并不坚决地充了一会英雄，我说干脆就说是我住院时从一个早已忘记了姓名的病友那儿抄来的吧。几个朋友都说不好，说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坚持。几个朋友说先别急，等A和B来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晚，最好的办法是眼前的祸事梦一样地消失。

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只是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代，大家一会为她担忧，一会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马虎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若果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歉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 “诛连九族”的恐慌

十四年过去，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个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由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的，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

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蔽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怕了，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诛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语。这就又要想了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

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是七四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作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移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一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诛连九族”都更是殃及的亲人呢！所以“诛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 筛眼中的回忆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深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我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七八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八三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 原载《明报月刊》 1989年1月号 输入：周其弘

∞ ∞ ∞ ∞ ∞ ∞ ∞ ∞ ∞ ∞
北京一〇一中学发明的“第三层思想”
• 杨瑞云 •

三十年前笔者正是十五岁，在北京一家干部子弟云集的一〇一中上学。课余爱看世界名著，还时不时地作着些海阔天空的英雄梦。文革初起，我也曾跟同学一起把脖子上系的“红旗一角”扯下，胡乱缠在左臂上，便阿Q一般的造反，作了红卫兵，给老师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时的感觉有如老贫农翻身得解放，真是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而且觉得未来是充满了希望。通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一个民主的（巴黎公社式）、平等的（消灭了三大差别）、纯洁的（没有官僚腐败、私有财产和自私自利之心），充满朝气活力的新型社会将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并成为引导全人类走向光明的旗帜，真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记得当时一〇一中学生们曾自发地在校园中点起篝火扭秧歌，狂欢庆祝直至深夜。参加的人何止一百两百，每个人都象当年欢迎解放军进城一样兴高采烈。

与之相比，文革前的六四、六五年，我的日子则很不好过。在一〇一中，虽不能说是度日如年，总之也是十分难熬。劳动、阶级教育、忆苦思甜、思想改造……搞不好就会被老师揪住辫子上纲上线地批评教育一番。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我有时真不想再跨进一〇一的大门（而当时我还算是出身好，学习拔尖的那一类学生呢

。我的缺点则一向是自由散漫、不关心政治、生活不够艰苦朴素）。

说起那两年中最令我不堪回首的经历，恐怕要数那次汇报第三层思想的活动了（此项活动别的北京中学似乎都未进行过，包括与一〇一中近在咫尺的清华附中，怀疑是否该为我校老师申请专利）。何谓第三层思想？我们的政治老师说，就是你在公开的场合不说、私下也不说，最反动、最肮脏、最可怕、一闪而过，连你自己也不愿意面对，可是假如你抓住它，面对它就会被它吓一大跳，所以你对任何人都绝对不会谈起的那些思想。现在我们要把这第三层思想挖出来，写下来，交给老师，“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隐瞒”，因为老师说了，假如你隐瞒，这些思想就会继续发展，成为你灵魂上的污点！像癌症一样，最终致你于死命！

这件事今日写来似乎实在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晒。但在当时对于一个才十四岁，毫无政治、人生经验，而又非常相信老师话的我来说，这思想汇报不啻是一场恶梦，一道真正的鬼门关，弄得我许多天不作贼也作贼般的心虚气短。左眼跳，右眼也跳，茶饭无心，坐卧不宁，生怕这位老师哪一天找我去教研室谈话。文革初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即由此起，而且这类事在当年还远不止这一桩，桩桩件件，加在一块儿，我也可以弄本血泪账控诉一番了。

平心而论，这笔账可不该全算在老师们头上。话虽如此，有毒有病的种子却从此人不知，鬼不觉地埋在了我幼稚的心田里。不久这些种子就因遇到了合适的气候（文革）而发芽、疯长起来。不但疯长，且又衍生出许多怪异的变种：深深的自卑感变成了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对政治的厌恶变成了对政治狂热的投入。不安全感使我急于表现，怯于思考，随大流，赶时髦，专爱火上浇油，绝少雪中送炭。心虚气短使我狂暴，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想跳起来作人身攻击。试想，把灵魂都曾剥得几乎一丝不挂的人，哪还会在乎什么人的尊严、公民的权利？

更何况世上唯有懦夫最希望人们称道其勇武，吝啬鬼永远不遗余力地试图博取慷慨的美名……凡此种种，至今思之犹令我痛心、惭愧。这笔账却不知该怎么个算法？三十年前的是非曲折，种种矛盾扭曲的心态，三言五语怎能讲得清？我不知该如何求得我那些中学老师的原谅。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完全原谅了我的那些中学老师。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回过我的母校：一〇一中学。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2008期

~~~~~

【动态交流】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将毛纪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馆的倡议

谁都知道，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是当年华国锋搞“两个凡是”的产物。文革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劫难，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浩劫；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宣布文革结束以后，作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毛泽东依然躺在纪念堂里受成千上万人的朝拜，他的思想理论也依旧被奉为共产党指导思想，中国不但还有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而且共产党也用供奉毛泽东的方法，维持着重新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尽管文革结束后中共一度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可是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等等的大小政治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在最近，中共党内的顽固派还以所谓万言书的形式，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批评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这一切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今后在中国重新发生文革并不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个不能在灾难中总结并汲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代价，变成对后人的警戒，使文革悲剧永远不在中国重演，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勿忘这段历史，上海巴金老人，多年前就提出了他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但声称要“彻底否定”文革的中南海领导人迟迟不予理会，更有甚者，中国大陆研究和反省文革的文章、活动，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文革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重新在官方和社会生活中抬头萌动，所谓的“毛热”如同一个幽灵，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新老权威主义和泛民族主义等思潮，又出现了泛滥的势头，那种氛围环境使得面临转型的中国社会，前景实在堪忧。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需要不断提升全体国民的素质，这都要求我们必须正视文化大革命这段令人痛苦的历史，以各种方式反省这段历史，并以这段历史教育后人，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现在我们郑重倡议：将天安门广场上的所谓“毛主席纪念堂”，尽快改成“文革博物馆”，利用现有的设施，在迁出毛泽东尸体的同时，增加遇罗克、王申西、张志新、彭德怀、刘少奇等众多文革受难者、受害者的惨痛史实，中共与文革有关的决议文件、文革中涉及全国性的重大事件等等。由此，既可以避免拆毁纪念堂带来的剧烈变动，同时又达到还历史本来面目，给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作用和责任一个客观评价的效果，从而体现出“文革博物馆”的各项功能。

将“毛主席纪念堂”，尽快改成“文革博物馆”，是一项现在就需要做，而且也能够着手做的工作，一切硬件都是现成的，所有软件也可以在运作起来以后不断地充实完善，关键维系中南海领导人一念——真正有决心不让文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常常以二十一世纪的责任和眼光自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信只要对人间有悲悯之情，对天地有同情之心，对历史有深远的感受，应该乐于见到本倡议变成现实。

倡议者签名如下：（本倡议欢迎散发，签名亦可传真到：6 1 7 — 6 2 3 — 7 1 5 3）

孟浪、傅海嘉、王鹏令、王军涛、齐墨、张伟国、谢幼田、杨建利、胡平、陈奎德、郭罗基、林长盛、陈嘉曜、丁抒、邵剑平、赖安智、戈扬、连胜德、吾尔开希、牟志京、韩延安、傅纪青、伍松林、张国良、晁阳、周菊子、尚瑞、司马璐、羊子、孙云、薛伟、李莹、张益唐、费铮铭、赵京、张欣、卢扬、霍壮、蔡崇国、席海明、相林、秦晋、尤世伦、林子健、赵南、杜智富、马大维、金晓炎、王显光、万润南、周小萌、李刚、邢铮、刘玉斌、王若望、金尧如等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cnd-cm@cnd.org>   |
| 本期 校对：  | 赵 桦（美国）   | <cnd-cm@cnd.org>   |
| 读者技术咨询： | 徐名扬（澳大利亚） | <cnd-help@cnd.org> |
| 网络技术维护： | 熊 波（美国）   | <cnd-info@cnd.org> |
|         | 关蔚禾（美国）   | <cnd-info@cnd.org> |

《华夏文摘》主编： 萧 同（美 国） <cnd-cord@cnd.org>  
《CND》总编： 温 冰（加拿大） <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N.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 ftp.cnd.org[132.249.229.100]： pub/hxwz

（加拿大读者可用：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hxwz）

考访服务站（Gopher）： cnd.org（中文或英文目录）

万维网服务站（WWW）： http://www.cnd.org/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本期编辑用软件： XLBR2.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